



# 话语权力与20世纪 90年代后中国文论转型

葛卉 著



90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话语权力与20世纪 90年代后中国文论转型

葛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权力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文论转型 / 葛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04 - 9087 - 6

I. ①话… II. ①葛…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理论 -  
研究 - 中国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5090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特约编辑 张 剑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全 子

技术编辑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 邮购 )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方克强

“知人论世”、“文如其人”之类，都是一些“熟透”了的老话。然而，文艺学往往示人一副一本正经的呆板面孔，因此我觉得，先说人再论文，可能比较有趣。

本书作者葛卉就是一个有趣的人。她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随时随处浮现在脸上的灿烂笑容。未语先笑，说话时“欢声笑语”，很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即使在学术问题讨论中她发表不同观点与批驳意见时，她也总能够“笑着说”，不仅先在态度与自信上胜人一筹，同时也使争论变得愉快。这不由得使我琢磨：究竟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养成的良好习惯？

其实，我更乐意将葛卉的笑容看做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也就是说，她的生活个性指向并蕴涵着她的学术个性和立场。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多元化与对话性立场的坚守，二是既追求批判性而同时又力避简单化的否定性。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如何在话语权力的批判下发展、建构具有生命力的中国文论。对此，葛卉主张“综合创造型”的观点：“综合创造型的中国文论建设可以说是符合当下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如何来对待古今中西的这些文论资源，我们还是需要秉持着批判的方法，批判是学术得以发展的动力。对理论资源的批判一方面对于文论话语的一次清理工作，取消其在‘体制’化过程中所附加的种种权利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新理论话语的生产过程，是理论知识得以生长的新基点。因此，对于批判我们应该将放在问题面前的那副否定的‘放大镜’挪开。”此外，中国文论的建构问题又必须置放在世界

格局与中西框架中加以思考，以对话的方式并在对话的进程中予以解答，葛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和坚定的主张：“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西方，在权力网络中不应该是对立的二元，也不应该是静止的、不变的存在。恰恰相反，在世界格局变换的空间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中国文论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对话的场域，但这绝不单纯是在对西方文化做出正负价值评判的场域……摆脱民族的视阈局限，使得对话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才能真正实现话语权力的生产功能，而这也才是中国文论走出自身限度的契机。”以上观点，是有新意、睿智和大眼光的。对话不是对立，对话意味着平等与非语言暴力；多元化隐喻着宽容与竞争，非一元论的专制；批判性不等于简单化与夸张性的全盘否定，而寓示着一种同情的理解和开新的能力。这又使我想起了葛卉的笑容，也许她的笑容真包含着那么丰富的人文与学术内蕴。

有一次我与葛卉之间的师生对话使我至今难忘。我读葛卉的论文时，深感她受到很好的文艺学专业训练，理论思维清晰而严密，表述简洁而有力。我对她说：“你的理论思维能力已经可以跻身于中国一流女学者的行列。”这是我阅读中国女性学者写作的真实体验。可我没想到，葛卉随即机灵地甩过来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当然是笑着说的，似乎还带着几分调皮和挑战：“那么我与男性学者比呢？”真的，回答这个问题有些难度与麻烦。其一，女学者毕竟人数少，由于我关注过女性主义，名声大的基本摸底，而男学者人数众多，根本看不过来。其二，女学者搞哲学等抽象思辨领域的人更寥寥无几，男学者中却大有人擅长此道。其三，一旦涉及性别视角，对话者又是异性，话题敏感而易犯错误。记得我当时心急慌忙，只得含混地应付过去：“也差不到哪里去。”事后想来，葛卉的追问，可以解读成对性别视角（包括女性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一定程度的摒弃，以及学术问题就应该用统一的

无性别的学术客观标准来衡量的理念。此外，从潜台词的发掘与内心心理的窥探方面来说，我感受到葛卉学术志向的上进与高标准。

葛卉的学术个性与学术追求，具体体现在本书中，就有了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论题选择的理论价值与当下意义。西方话语权力理论是一个学理性很强的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转型则关涉到历史的追溯与评价、现实的跟踪与把握、未来的制约与展开，其理论探讨的实践品格与当下意义显而易见。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既建基于西方话语权力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发生巨大影响这一理论事实之上，同时话语权力的民族向度又提供了作者考察与反思中国文论转型的基本理路。这两者契合而成的论题可以说是顺理成章，表现出历史与逻辑的张力。其次是本书所体现出的作者研究方法中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绪论是以四个递进、深化的问题提出开始的，从现实与研究对象中发现问题并提炼问题，是作者思考与论述的基本方法。问题的产生是研究的前提，也是新的知识生长点与理论的价值性所在。批判精神同样如此。如前所述，葛卉的批判不是“放大镜”下的全盘否定，而是同情的理解与局限性的发现。本书中，作者对西方话语权力理论“权力化”倾向与“本体化”建构的反思是深刻和发人深思的：“但又将主体泯灭在权力构成之中，从而消解了自我阐释的可能性。在一切权力化之中，我们无法为批判对象拟定批判的标准，那么也就无法解释批判的合理性。”再次是理论表述的清晰与严密。这点既体现在全书框架与思路中，也渗透在作者对各种理论观点的阐释与评价上：中肯、简明而有力。

最后，我祝愿葛卉笑容常在，在学术上有长足的进展，实现跻身一流的远大志向。

# 攀登者的足迹

——葛卉著《话语权力理论与20世纪  
90年代后中国文论转型》序

夏之放

2001年至2004年，葛卉来到我的身边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后去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执教于青岛高校，前后十年，一直同我保持着思想上的密切联系。现在，她的理论专著《话语权力理论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论转型》就要出版了。她嘱我为之写序。我深感责无旁贷，便答应下来。随后找出她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来重新读了一遍，许多往事也一幕幕在脑际闪现，思绪奔涌，难以自己，心中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思之再三，还是觉得从见证者的角度谈她的成长过程的特点以及希望为宜。

十年前，葛卉第一次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她的那双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深沉的眼神就给我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那是年轻人纯真无瑕的眼神，是无私无畏的眼神，是执著任性的眼神。三年间，她如饥似渴地吸收相关学科知识的营养，大跨步地攀登学科制高点，她的进步是十分显著的。葛卉聪慧机敏，悟性极高，一点就透，常常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她十分注重中西哲学的学习和思维能力的训练，由对于知识的渴求转化到对于崭新思维方法的吸收和运用，很快地，就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学术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所以她的提高是伴随着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建设的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提高。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沧浪诗话〉的接受理论》，其选题角度包含着中与西、

古与今、创作与接受等几个方面的对立、对比研究，出奇制胜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总结严羽的《沧浪诗话》的思想，表现出卓越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此后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在吴炫、方克强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和胸襟，提高了自觉的学术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以话语权力理论为切入点，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争论和建设为考察对象，在涉及古今中外的广大思想范围中纵横驰骋，而能够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于论题中心的全神贯注，对于所论的大小问题均能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分析和个人见地。这种横跨多个学科的透视力、居高临下的气势、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已经足以显示葛卉学术个性的确立和走向成熟。对于这部学位论文所取得的成绩及其所达到的高度，答辩委员会诸位教授自有其明确的评判；对于这部著作的说服力和学术价值，读者诸君也会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在我看来，这些都无需我多说。我想要说的是，这部足以显示新锐力量之学术功力的著作，对于成长中的葛卉本人来说，既是初登学术园地的亮相之作，也是继续前进的重要阶梯，因为它标志着“攀登者的足迹”。

差不多也是在十年前，我在给赵建军著《美的代码和意蕴》（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感受：“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顾我国美学事业百年来的发展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大潮将至的喜悦。因为一批羽翼丰满的美学新军已经立于潮头，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头脑捕捉时代的新问题，展开了超越前人的新思考；这一批新军，在主客两个方面都具有超出上一代人的条件，他们理应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前人。作为美学研究领域的一名成员，我不仅为作者的新著而高兴，同时更为美学新军的涌现而欢呼，为即将到来的中华文化建设的高潮而擂鼓助



威。”跟赵建军相比，葛卉是更新一茬的年轻人，主客观条件也更为优越，我祝福这批学术新军攀登新的理论高峰，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2010 年 4 月 26 日 于历下听涛居

# 目 录

引言 .....	(1)
<b>第一章 话语权力理论的西方渊源 .....</b>	<b>(22)</b>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力理论发生的社会 思想背景 .....	(22)
第二节 尼采——发现权力 .....	(29)
第三节 福柯——走向话语的权力 .....	(36)
第四节 萨义德——走向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力理论 .....	(44)
第五节 其他理论家——视角化的话语权力理论 .....	(52)
第六节 小结 .....	(59)
<b>第二章 话语权力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b>	<b>(70)</b>
第一节 话语权力理论在中国接受的可能性 .....	(70)
第二节 中国内地学界对西方话语权力理论的探索 .....	(77)
第三节 话语权力理论在中国内地学界的运用 .....	(89)
第四节 港台学者对话语权力理论的研究 .....	(104)
第五节 海外华人学者对话语权力理论的研究 .....	(113)
第六节 话语权力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反思 .....	(120)
<b>第三章 话语权力理论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中国文论 .....</b>	<b>(126)</b>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论概况 .....	(127)
第二节 话语权力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论考察 ——“中华性”讨论 .....	(131)
第三节 话语权力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思考	

---

——“失语症”讨论 .....	(145)
<b>第四节 话语权力理论与中国文艺学学科转型</b>	
——“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 .....	(160)
<b>第五节 小结</b> .....	(173)
<b>第四章 话语权力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b> .....	(179)
<b>第一节 话语权力理论的限制</b> .....	(180)
<b>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话语权力反思</b> .....	(184)
<b>第三节 话语权力理论视角下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反思</b> .....	(195)
<b>结语</b> .....	(203)
<b>附录一</b> .....	(206)
<b>附录二</b> .....	(212)
<b>参考文献</b> .....	(222)
<b>后记</b> .....	(233)

# 引 言

## 一 问题的提出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话语权力理论<sup>①</sup>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加以考察与反思，这一考察与反思将主要在话语权力的民族向度上展开。<sup>②</sup>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先就几个问题做出解说。

### （一）为什么是“话语权力”，而不是话语和权力

传统的“话语”观，最初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正如托多罗夫所言：“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的对应物，……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sup>③</sup>。可以看出话语作为

---

① 话语权力，即 Discourse/power。国内常见的其他译名还有“话语权”、“话语力量”等。power 的德语是 pouvoir。在福柯的著述中，pouvoir 一词应该是“力量”（forces）、力量关系的意思，而不是指政治权力。但目前在汉语界，“话语权力”是学界的普遍用法。

② 本文所讨论的“民族”向度是话语权力中的民族问题。民族在英语中对应的是“state”与“nation”二词，但这两个词语在汉语没有区别。在英语中，前者更偏向于“主权国家”的政体，后者则是以族群为基础的共同体。在本书中，90 年代文论中的争议也都在“中”、“西”中摇摆，这里的“中”、“西”的界定是基于民族基础上的，涵盖了前后两者的意义。因此，本书决定采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定义的“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第 6 页）

③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 页。

语言学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言语，是由词汇和语法规则所限定的语言的实际应用。而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指的是对对象的合法占有，它一方面指对占有者的合法认可，另一方面意味着对占有者以外的任何人介入占有状态的合法阻止。因此，在传统的观点中，话语形成于言语交流，权力作用于政治实践。权力的运作虽必然利用话语，但它们毕竟是两回事。

但是当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话语权力”思想后，这一传统的分立被打破了。在福柯看来，话语并非一个名词或者一个范畴，它是除“言语”和“语言”之外的第三者。它并非词汇与句子简单的组合，也不仅仅限于语法规则的控制，而是蕴涵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又反过来产生权力。话语和言语的差别，可以说是两种视角的差别，后者被认为只是服从于自由交流的需要，而前者则将这种自由交流解释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话语范畴的提出，是将政治学维度置入传统语言学领域的结果。

不过，在福柯那里，话语权力尚未形成一个严格的术语。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分别在语言学、存在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应用着“话语”的含义，以证明权力在话语形成、话语实践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话语权力，“它是言说者对话语因素如语言或言语的合法占有”<sup>①</sup>。但是，仅凭占有话语因素，还不足以构成一种话语权力。话语权力不是静止的，只有当其往来于在场者之间时，也就是作为话语被使用着时，才会生效。这不仅意味着个人的自言自语，被排除在话语权力的问题域之外，更重要的是，话语权力这一范畴从一开始就拒绝被等同于“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逻辑，它是一个在动态、开放的过程中生成和显现的机制，而非一种古已有之的身份意识，它是一个全新的研究

<sup>①</sup> 查常平：《艺术话语权力的社会性、历史性》，《艺术评论》2004年第3期。

对象。话语权力研究绝非话语研究和权力研究的简单拼贴（或者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事实上，当福柯以其原创性的研究，揭示出西方社会话语权力在某些领域的生成机制时，他已经将我们带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观念和新方法。不管福柯本人如何反感那些“制度性”的定义，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话语权力不是话语与权力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范畴，它所开辟的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二）话语权力是否成就了一种理论

笔者必须强调的是，有“话语权力意识”是一回事，建构一种“话语权力理论”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只有在话语权力理论基本成形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何谓话语权力。在西方，话语权力理论的形成源于结构主义以来对知识本身的持续反思。福柯深刻地指出，权力生产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sup>①</sup>。这种权力与知识的本体性关联，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压制”、“否定”，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它不是外加给知识的，而应该归属于知识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研究者的责任就是将加载在话语之上的权力关系逐层揭示，同时复现话语生成的微观过程。那种将话语理解为封闭的符号系统的流行观念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日显僵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被重新导向社会历史文化的纵深领域。这既成就了一种对知识本身的极为有力的批判，又为新的知识话语的生成打开了大门。事实上，福柯对话语权力的揭示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

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

---

<sup>①</sup>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页。

义”的兴起。新历史主义者以海登·怀特为代表，他运用话语权力理论批判了传统的历史观，而将历史的文学性发掘了出来。<sup>①</sup>他将历史看做是“仅仅通过把纯粹的编年史编成故事而获得部分的阐释效果；而故事反过来又通过我在别处称为‘情节建构’的运作而从编年史编造出来”<sup>②</sup>。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围。历史成了虚构的文本，“历史话语”通过这个编写制度来获得阐释的权力；反过来，这套历史话语又生成了新的编写体例。所谓历史就是具有文学性的话语与权力合谋制造的一个文本。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基本上延续了福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通过批判福柯有关种族话语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话语权力在民族维度上的思考。东方主义者萨义德认为，尽管福柯也论述了种族话语的权力机制问题，但他并没有摆脱“欧洲白人中心”的视野局限。萨义德通过对西方文本中“东方镜像”所隐含的话语权力的“谱系学”考察，发现一种新的“殖民”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话语权力的中心。这种意识通过一整套“殖民话语”体现和维持着，这就是所谓“后殖民”主义。萨义德以此开启了话语权力民族向度的思考。除此之外，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日见兴盛的文化研究都受到了话语权力理论的极大影响。因此，称其为最具生产力的当代理论之一，一点都不过分。

（三）何以是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而非是 80 年代，或者其他时段的中国文论

首先要明确的是，考察话语权力理论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不是简单地做一个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描述，而是要深入探究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中

---

<sup>①</sup> 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要通过建构一个连续的、宏大的、光滑的叙事以赋予其存在的合法性，实现其传达文化的功能。

<sup>②</sup>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5 页。

国文论，是希望获得对中国当代文论全面而透彻的把握，话语权力理论所提供的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或者线索。

相比之下，80年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写定的时代”，而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性质和走向问题，仍然保留着它扑朔迷离的面相。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转型期”中，但是究竟该如何把握这种转型，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似乎很难与文论的转型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倒是丹尼尔·贝尔等人有关“后冷战时代”的论述揭示出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生成的一个隐秘机制。贝尔认为，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化格局被多极化发展趋势所取代，而文化冲突便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表现方式。这种文化冲突不仅会影响到中西文论的交往方式，而且会影响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建构。

有学者认为，1992年是中国当代文论转型的起点，这是1986年到1991年的中西“碰撞”阶段的后继。<sup>②</sup> 继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之后，中国文论在90年代开始全面反思，文论的“民族”性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谈论不再是简单地重复相对主义/普世主义的争论，而是在对西方文论已有更通畅地了解 and 更全面地吸纳的前提下，对中西文论交流过程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我们知道，以往中国文论吸纳西

---

<sup>①</sup> “转型”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的一篇《掌握农村经济转型的度》的文章中，而文论中的“转型”则是在1989年《人民日报》2月28日的文章《“转型期”创作谈》中。正式将“转型”定为社会发展目标的是1993年的十五次人大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并由此带动了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转型。如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转型。在微观上，则是在社会分配形式、阶层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开始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期。

<sup>②</sup> 这个时间的划分参见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方文论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西方理论话语整合中国文论话语，另一种是用中国文论话语整合西方话语，近似于“西体中用”和“中体西用”的差别。而所谓“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要么是基于价值之争，要么是出于体系的考虑，都将中国文论的建构看做是中国学者的理性运作和自主选择，而对所谓“中国”、“西方”也基本上是作着本质主义的理解。但当话语权力理论进入中国之后，学界对于中国文论的认识与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如同话语权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语言学静止、封闭的语言系统观一样，它同样推动着中国当代文论走出 80 年代对“语言游戏”、“形式批评”、“系统论”的狂热，转而思考如何在一个充满着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的话语场中，构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人们开始意识到，一种主体性或者说特性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话语权力持续斗争的产物。而对今天的研究来说，考察这种斗争的内在机制，将话语生成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历史关联揭示出来，既不是为了给中国理论或者西方理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也不是为了放弃对普遍价值的追求，而是真正地进入文化的当下抉择之中。

有理由认为，中国文论界有关话语权力问题的思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建构。我们看到，知识批判方法的运用，尤其是话语的“谱系学”分析，开创了文论、批评思维的新方式。诸多领域开始了自我清理工作，表现在具体方面便是出现在各个领域的“重写”工作。如重写文学史、重写思想史、重写哲学史、重写文艺理论等等。<sup>①</sup> 短时间内，福柯、后

---

<sup>①</sup> 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就是“描写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取消了传统历史的“中心性”描述；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等，都直接对本质主义文学观与思维方式进行反思、质疑与批判。